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SHIXUESHI TONGLUN YU JINXIANDAI ZHONGGUO SHIXUE YANJIU

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

张越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

张越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张越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1961-5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38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8.5
字数: 277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韩凌燕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目 录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1
史学史研究中的中国史学通史撰述	17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39
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60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探析	64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82
学术期刊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史学	95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	128
五四时期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	147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	158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171

对顾颉刚疑古学说及古史论辩的简要回顾与评析	180
20 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190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性	202
从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的评价看郭沫若的史学思想	218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228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242
“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	255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	265
尹达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贡献——读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273
辨章学术 以启后人——简评内藤湖南著《中国史学史》	279
后 记	288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 与研究趋向

尽管“史学史”学科在中国仅有不足百年的历史，而史学史的意识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则要长久得多。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就是先秦时期对史学发展的初步表述。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到班彪、班固父子的论著，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到《隋书·经籍志》，从郑樵《通志》中的相关篇章到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古代学者不仅对历代史学发展有许多纵向评论，还横向论及了“实录”精神与“信史”原则、史书体裁体例、史法与史意、采撰与文辞、史学功能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些论述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史学史意识的集中反映，也正是有了前人对历史学不懈的总结和反思，才使中国史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不间断地呈现多途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众多的史家和浩如烟海的史书，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缘于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想的不断输入、经学的衰微失势、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被打破、在西式科学化的学术分类体系中史学得以独立等学术背景，近代意义的史学史学科出现了。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强调史学“很有独立做史资格”，这被认为是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的标志。自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不断受到重视。21世纪以来，已经相继有几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出版面世^①，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成果。回顾和总结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路径及特点，是展望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向的前提，也是促进和加强学科建设的条件。

^①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全3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史》（全10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全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全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一、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展开，相继出现了十余种史学通史性的讲义和著作^①，以及数百篇相关论文^②。其中公开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史学史著作，当属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以及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商务印书馆在1941—1944年的三四年间即出版三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可见“当时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势头还是相当强劲的”^③。还应当注意到，在此期间发表的论及中国史学的论文，其中一些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不仅对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章学诚等重点研究课题有了较详细论述，而且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广度”^④。有学者指出：

史学史专书以外，最值注意者，为发表于各学术性杂志之史学史论文，晚清以来，论述中国史学史之精华，荟萃于此。洋洋巨观之一部专书，往往不如一篇论文更富学术性。专书每流于驳杂，为字数而拼凑材料；论文则专精，能道前人所未道。如金毓黻之《释记注》、《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二文，较其在《中国史学史》中所谈及之记注之法与唐宋设馆修史始末，实更为详密精确也。^⑤

^① 详情可见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2）；牛润珍：《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8）。

^② 陈光崇主编、赵俊编辑的《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1900—1981年12月）》（辽宁大学历史系1983年印刷）对该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和著作作了较为详尽的分类著录。

^③ 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载《南开学报》，2004（2）。

^④ 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4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⑤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序》，见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7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

这些史学史著作和论文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然粗具规模”的积极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多数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以梁启超设立的“史学史的做法”框架为基础，论述方法受到古代目录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①，史学史著作更像是史部要籍解题。如金毓黻即直言他的《中国史学史》“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②。戴晋新评论说：金、魏、王“三书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史官、史家（史籍）、最近之史学趋势，同为主要内容；魏书将刘知幾、郑樵、章学诚列为专章；金著将刘知幾、章学诚合为一章，也都有迹可寻。”^③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多部史学史著作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来看，的确可见梁启超“做法”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梁启超“做法”的“细化”，但也不可就此认定这些著述完全没有自己的特点。例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将魏晋迄唐宋以来的史籍分私家修史和设馆修史两大部类来叙述，涉及众多私修和官修的重要史书，而在梁启超的“做法”中却明显轻视官修史书；在史官方面，梁启超更强调“史官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④，金著则更在意对历代史官制度兴废沿革的考证与阐述。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的上编专论中国史学的特点与价值、中国史籍的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的建置与职守，下编叙述远古至民国诸时代的史学发展情形，并强调“尤注意史学家之史学理论与方法”^⑤，其上编所列的内容颇为清晰允当，在论述上虽失之简略，但是问题的提出和全书的安排也是有一定新意的。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中有“历史哲学”一章，述及中国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三正三统论、皇极经世论、三世论、神学史观、垂训借鉴史观、科学史观等，所论虽不乏牵强之处，但至少表现出了对梁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166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③ 戴晋新：《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1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3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⑤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2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

启超“做法”的某种突破。

必须承认，受西式学术分类体系的影响而在中国产生的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因而，就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而言，一段时间里专注于研究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梁启超划定的史学史研究范围，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是有其必然性的。草创之功，殊为不易，处于史学史学科开始阶段的多部史学著作和大量的史学史研究论文，为本学科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问题在于，在以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为主要特点的同时或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还应当关注什么？

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该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影响较大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例，该书出版之后，白寿彝和齐思和分别撰写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白寿彝认为：“书中说史或史家的地方，很少是说到法式或义例的，说原理的更难见到。”“我们固然大当要求作者具备某种史学观念，但我们必须要求作者有‘一个’史学观念。如果写史学史而没有自己的史学观念，这本书如何能使读者看得清楚呢？”^①齐思和说：“抑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书名史学，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进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②无论是“史学观念”的缺失，还是“史学之义”的未尽，两位评论者其实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金著对于史学以及史学史自身概念及理论范畴方面认识程度的不足和论述内容的薄弱。这也不仅是这本著作的问题，而是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走出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必须深化对史学之义和史学史观念的认识，对史学史课题观念的改变，则决定了史学史研究及史学史学科的走向。

^① 白寿彝：《评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原载《文讯月刊》，第7卷，1947（1）。引自《白寿彝史学论集》（下），1246、124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② 齐思和：《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载《燕京学报》，1947-06（32）。

二、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沉寂^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成果还是在学科建设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发展。自1980年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后至今，各种中国史学史专著有20余种^②，研究论文则难以计数。如此多方面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的取得，与20世纪60年代前期进行的关于史学史问题的讨论不无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初，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史学史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其教材的编写成为亟待进行的一项工作。缘此契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召开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目的、教材撰写原则和方法等作了较为广泛的探讨^③，许多学者在他们的发言或文章中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这番讨论对史学史研究的影响虽因随后史学史研究的中断而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其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审视的意义和价值仍不可忽视。如白寿彝撰写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④两篇文章，前者将史学遗产区别于历史遗产作专门论述，提出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对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对历史文学的研究等史学史

^① 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重新修订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该书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再版；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有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铅印本；大约在同一时期，刘节撰成讲义《中国史科学与史学史》。金书属再版，白书及刘书均属未正式公开出版，因此，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史学史著作相对寥落。

^② 参见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载《史学月刊》，2003（10）。

^③ 相关情况可参见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讨论》，载《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4）；《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文汇报》，1962-03-14；《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62-03-23；《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1）；《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2）；《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载《学术研究》，1963（1）等。

^④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载《新建设》，1961（4）；《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02-29。两文均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的主要研究内容；后者通过对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史学史研究任务中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分析，将史学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作了说明。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①一文，在分析了一些外国史学家对史学史所下的定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史学史的自身特点，对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20世纪60年代讨论中的一些见解，不免存在当时史学界在理论认识方面的特有印记，但是从总体上看，通过讨论所获得的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研究目的、史学史应如何分期、分期的标准等问题的初步认识，正是此前以要籍解题为主要特征的史学史研究所亟须充实的“史学之义”之内容。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还表明，深化对“史学之义”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讨论层面，全面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还需要进行多方位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成果，大体是建立在前一时期对史家、史书的要籍解题式研究基础之上，再辅以20世纪60年代对史学史讨论所形成的基本认识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些新见解综合而成的。白寿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②将此表述与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形式联系起来，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并关注史学自身功能及其社会作用的体现。这样的研究趋向，可视为是继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向。从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促使史学史研究者能够从史家、史书中将研究视野扩展开来，对中国史学的整体脉络、发展节奏与特点作宏观分析。瞿林东指出：

^① 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载《学术月刊》，1961（10）。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29页。

在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的面貌。^①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之课题视野的演变路径是，从中国史学史中的史家与史书，延伸至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学的发展。课题视野如此变化，理论层次也就相应提高，诸如史学发展与客观历史发展的关系、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不同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特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分期以及分期标准问题等关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受到相应重视。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研究已具有相应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拓展的态势，以下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史学以叙事见长而没有理论。为了澄清这种误解，也为了系统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以瞿林东为代表，从史学批评入手，进而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瞿林东于1992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此后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等一系列论著^②。这些研究成果，或分时段，或分专题，或纵向梳理，或横向论述，发掘和梳理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如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民族关系、“成败兴坏之理”、“英雄”与“时势”等）和史学理论（如史学、史才、史德、史义、书法与信史、史学功能、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两个方面的理论遗产，不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开创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②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载《历史研究》，1992（2）；《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史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性意义，而且也极大丰富了当代的史学理论研究。

（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成果数量明显增加。中国史学的发展自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发生了显著变化，固然，中国近代史学是承续古代史学而来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到西学的强烈影响逐渐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以“从现在看过去”的角度而言，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对当下史学的发展及未来史学的展望无疑更有意义。先是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于1989年出版。该书以大量充实的材料为基础，率先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作者强调，应将近代史学“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上加以透视。因而在本书所定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①，如此撰述旨趣，是与20世纪80年代史学史研究的趋向相吻合的。此后，对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转为以思潮和流派为主要方向，如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依历史进程与时代特点来把握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对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主要流派、不同史观、理论问题都有独到的述评，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论述了新中国建立后40多年间中国史坛的若干史学思潮以及这些史学思潮的逻辑关系。当年梁启超提出的“最近史学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展成为今天颇具规模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涉及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诸时期的史学发展论著均已经问世出版。^②

^①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1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② 如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杨翼骧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已经陆续出版了3册。这是以传统史学中长编的方式编纂的史学史资料长编，作者倾几十年的精力搜集、抄录、爬梳史料，凡涉及中国史学上的人物、著作、事件、制度诸项皆以时间先后依次编订，编者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证，疑者存疑。如此“记注”之作，在笔者看来，其学术价值及学术生命力并不亚于某些所谓“撰述”之作。此种体裁的史学通史，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研究，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研究并非过时，在以往对史家史书的研究基础上悉数搜集、整理中国史学史上人物、事件、著作、制度等材料，并加以深入研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数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相继出版。其中，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于2006年12月全部出齐，这是迄今部头最大、内容最全面的论述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全书以“导论”、“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为第1卷，第2至第6卷分别为“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和“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以贯通的眼光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力图在对中国史学各时期的横向论述中展现中国史学的产生、成长、发展、继续发展、嬗变以及近代史学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重视每个时期的社会与史学的相互关系，重视对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中国史学遗产诸方面的总结。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史》以10卷本的篇幅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这对丰富中国史学史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谢保成主编的3卷本《中国史学史》“将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与按系列考察中国史学相结合，勾画中国史学主流与支流交错发展的实际。”^②我国台湾学者杜维运著3卷本《中国史学史》，是以中国历史上

^① 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第1册“先秦至五代”）、1994（第2册“两宋时期”）、1999（第3册“元、明”）。

^②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三），1504页。

不同朝代的时代特征与史学的自身发展、不同时期的史学特点与学术思潮走向、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家与史著、中西史学的总体比较与分阶段比较等内容为主题作综合阐述，重视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启迪作用尤深。

几种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完成、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此前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突出和强调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拓展和深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随之而至的问题或许更为复杂。朱维铮说：“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①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趋向和发展前景如何，则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趋向的思考

传统人文学科的独立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就学科史而言，更多的是从较为单一的、纵向性的角度对本学科内容的构建。其结果是忽视了学科史与学术史间的渗透关系。乔治忠说：

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进行的，近现代的专门学科形成之后，有力地推动了学术事业的进步，但各门学术在知识、方法是密切关联的，在发展进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果专门学科的研究在沿着自己关注的问题纵深探讨之时，过分囿于专业畛域而忽视了各门学术间的联系，则可能出现认识的轻重失宜、讹误或疏漏。^②

^① 朱维铮：《史学史三题》，载《复旦学报》，2004（3）。

^②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载《南开学报》，2004（2）。

学术史着眼于一段时期内学术发展整体性的价值评估、研究方法的归纳、理论体系的总结以及各学科相互关系的探究等。这对单独某一门学科史来说，似乎勉为其难。摆脱单一学科史局限的尝试，是将史学与社会时代结合起来。前一阶段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明显加强了在史学发展中注重史学与时代互动关系的研究，这不仅意在突破要籍解题式的窠臼，更对认清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以及双方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多有裨益。但即使如此，问题似乎依然存在，“比如，有些史学成果和一定的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有些成果和政治的联系较少，甚至有些和政治并无直接联系。对于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①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可视作摆脱单一学科史局限的进一步尝试。事实上，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将史学史纳入学术史的视角中深入考察史学的自身发展，突破狭义的史学畛域而涉及影响史学的诸多学术因素做综合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诸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经史关系、文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以来从历史观到史料观念的转变、中西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等问题，都更为研究者所重视。

以中国古代史学而言，传统学术之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固然将史部“独立”出来，但古人治学却从未囿此畛域，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无不贯穿经史子集各部。如果以今人专门学科的眼光讨论古代“史学”的内容，诸多含于传统学术中的史学资源或许会被忽视，史学史研究可能就会有不全面、不充分的缺失。对中国古代史学做学术史的考察，意在更多地回归在传统学术诸多因素之中理清史学的发展脉络、探析史学自身的撰述形式和理论内涵等特点，研究史学与经学、文学间的错综关系，揭示那些隐藏在史学发展表面之后的线索。如胡宝国在其《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就汉魏以来的经史之学、文史之学等专题作了专门论述，其目的“就是要把史学史的问题置于学术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他认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